

株洲日报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6年8月23日
星期日

丙午年七月十一

第24442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

连续出版物号

CN 43-0005



知株洲视频号



株洲新闻网

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我和《株洲日报》的故事

回望三十多年的业余通讯员之路——我与《株洲日报》的情缘

李放鸣



本文作者在《株洲日报》上发表作品的剪报。作者本人提供

从学校毕业进公社当电影放映员，到后来转任文化站站长，直至退休后被镇政府返聘，不知不觉，已过去近半个世纪！其间我与《株洲日报》的那些事儿仍镌刻在心头。
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我担任坪阳庙乡文化站长，撰写通讯报道成为了主要工作职责，而当时的我对通讯报道是一个“门外汉”。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，我首先向报纸学习。《株洲日报》成为我每天在办公室里首选阅读的报纸。这位无声“老师”渊博的知识、精妙的写作技巧，深深地感染着我，使我萌发了向该报投稿的强烈愿望。

1989年11月，我在下乡中获取了龙泉村八位农民路捡千斤公粮交国家的题材，回到乡里后立即写了一篇消息稿寄往株洲日报社，不几天就在第二版上发表了。当我第一眼看见时，眼前一亮，啊，我的稿子平生第一次变成了铅字，登在报上！从那时起，我和《株洲日报》结下了订报、读报、写稿的缘分，连续多年成为《株洲日报》乡镇业余通讯员。为提高稿子的质量，我悉心制作标题，尽量将导语写得引人入胜，常常连吃饭、走路时，也在不断思索。甚至晚上睡觉，当有“灵感”闪现，都会一跃而起，急忙抓笔记录。有付出，必有回报，我每年都有许多稿件在《株洲日报》发表。从《株洲日报》的小“豆腐块”到《株洲晚报》的专版，再到《株洲日报》的头版头条。从《株洲日报》起步，进而向《湖南日报》《潇湘晨报》《湖南科技报》《湖南农村报》等进发，我曾一度成为县内在省报刊发稿最多的乡镇业余通讯员。1998年，县委宣传部授予我“对外宣传十佳通讯员”称号。2014年，我临近退休之际，特将昔日在《株洲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自费出版《耕犁墨痕》一书，留作永恒的纪念。

我记得，1999年1月8日，《株洲日报》采用我写的“山乡文化站，喜上中央台”一稿，对推介、宣传坪阳

庙乡的文化工作成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2004年“七一”前夕，《株洲日报》记者黄永新、王兴夏，县委宣传部领导何纲华与我一道，采访九旬老党员20年义务办墙报的先进事迹，发表在报纸头版头条。2010年，坪阳庙乡文化站将清代《燕花歌》复活，在攸县首届广场文化节表演，我写成新闻稿，第三天发表在“报眼”位置。2017年，我在县“旺景区”指挥部编简报，将工作写成综合报道，发在《株洲日报》第二版头条。2018年夏，我将宁家坪镇党委、政府大力打造的“南湖党建先锋站”写成综合报道，在《株洲日报》头版发表，第三天就引来市里团队参观。

那是1992年春天，全国开展第二届“农林科教电影汇映”。当时，我既是坪阳庙乡文化站站长，又是乡电影队放映员。起初，由于没有“对号入座”的科教片源，下乡放映激发不起群众兴趣，汇映工作一时陷入困境。我针对这种状况，赶写了一篇言论稿发往《株洲日报》。时隔数天，此文发表在《株洲日报》第二版。这篇报道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重视，部长出面安排文化部门领导解决这一问题。县电影公司经理通知我汇报情况，不几天，县电影公司的领导带上我预先选择的25部农民热切盼望的科教片，专程来到乡里，帮助落实科教电影汇映事宜。县电影公司、株洲洗煤厂社教工作队与坪阳庙乡政府共同筹办了“坪阳庙乡笔武村科教电影汇映周”，在笔武村部放映了25部科教电影，有逾万群众观看。

1992年7月，我获得国家农业部、林业部、广播影视部、文化部、国家科委、中国科协联合举办的“全国农林科教电影汇映”奖励，这是平生获得的最高荣誉！但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《株洲日报》给我“送来的”。

34年过去了，抚摸着证书、这些业已发黄的旧报纸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啊，《株洲日报》，我该怎样感谢您！

往事温暖如初

——株洲记忆三题

编者按

这是三篇关于“回忆”的文字。一篇讲求学，在攸县师范，那里有青春最朴素的模样；一篇讲写作，与一张报纸的缘分，那里有文字被看见的欣喜；一篇讲行走，沿湘江毅行，那里有步履丈量过的坚持。三篇文章，三段往事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只因为一个朴素的原因——它们都发生在株洲，都沉在作者记忆深处，时隔多年翻出来，依然温热。

这些文字里都有当时的热切心跳，也有如今回忆时的柔软温情，尤其当看着那一张张旧照片，就仿佛回到过去。将这些温暖的往事并置于此，像翻开一本旧相册，一页一页，都是真实的曾经。

愿这些文字，能让你也想起某段温暖的旧时光。

旧址温情

回忆我的母校——攸县师范

武开龙

我是一名从教37年的小学老师。我没有上过高中，也没有读过大学。15岁那年，我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南攸县师范学校。

那年暑假是我最高兴的一段日子——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，父亲带上我，推着独轮车，把几袋稻谷送到乡粮站，完成了“转粮”手续。我终于跳出了“农门”，吃上了“国家粮”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前来道喜的亲戚朋友踏破了门槛，母亲做梦都笑出了声。开学的前一天晚上，姑父从他家里搬来了彩色电视机，给大伙放了一场录像；父亲将一个老木箱刷了遍大红油漆；母亲将几套换洗衣服塞在里面……

【一】

1986年9月1日，我懵懵懂懂背上书包，拎着红木箱，父亲驮着棉絮、草席，搭乘一辆“吱吱呀呀”的班车，来到了攸县县城。在珍珠巷，有座由两个大石狮守护的大门，门楣上方是毛主席题写的“湖南攸县师范学校”几个大字。

站在校门口，仰望“湖南攸县师范学校”的牌匾，我的心中无比自豪，暑假我就知道这个校名的由来：1955年6月，来自浏阳县（今浏阳市）的学员陈云——陈昌烈士的女儿，收到了一封令她终生难忘的信件，这是毛主席的亲笔回信。信封上“湖南攸县初级师范轮训班”字样成了“湖南攸县师范”校名题词。

从乡下到县城，我到了一个人人都讲普通话的地方。那位一年四季田间割草、山坡放牛的孩子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新奇；毛主席题名的校名、石榴树、假山、水上凉亭；热闹的操场、安静的阅览室；更有那藏书无数的图书馆和菜香四溢的大食堂……

同学们来自醴陵、攸县、茶陵、酃县（现改名为炎陵），清一色的农村孩子，各自操着南腔北调，可没几天就混熟了。相互一打听，彼此都是原来所在学校的佼佼者，有不少甚至是整所学校唯一考上中专的“独苗”。

开学典礼是在校园中心的一栋大礼堂里举行的，王春娥校长声音洪亮，她的开场白让我们激动万分：“同学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攸县师范就学，恭喜你们捧上了铁饭碗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一名人民教师。三年后，你们将从攸县师范出发，像蒲公英一样，飞向广大的乡村小学……”

从此，我们开启了三年的师范学生生涯。

【二】

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基、文选与写作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语文教材教法、数学教材教法等十几个科目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唯独英语不开设。

乡下的孩子没有音乐基础，体育课也只是跑跑步、做做操，美术课基本上是信手涂鸦，书法课更是连听都没有听过。可在师范的课堂上，我们必须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，因为老师都郑重地告诉我们——每一门功课都不能落下，每一门学科都必须考试达标，否则，就无法毕业。

杨老师和老师的音乐课堂没有花里胡哨，当我们不敢开口的时候，他敲响了黑板：“会说话的就会唱歌，会走路的就会跳舞。”一个学期后，我们人人都能弹琴、人人都能识谱、人人都能高歌一曲。

陈英军老师身姿挺拔，皮肤黝黑，英气逼人。在陈老师的体育课上，我们不敢有半点偷懒。站姿、少年拳、跳高跳远、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排球、篮球、单双杠、乒乓球、短跑、长跑……每一个动作都不能有任何瑕疵，每一项考核都必须达标。

周艳荣老师头上顶着个马尾，小巧玲珑，年

轻漂亮。体操、形体课上，周老师手上拿着一根竹条，抬头、挺胸、提臀、收腹，就全靠这根小竹条。一番折腾，我们居然都能劈叉、下腰，元旦晚会上，我们的《跳操》节目获得掌声无数。

陈永泽老师温和淡定，从来不会生气，毛笔就像他的第六根手指。书法课堂上看着他的示范，我们只能“哇”个不停。在陈老师的严格教导下，我们懂得了“颜筋柳骨”“蚕头燕尾”“平衡疏密”“结构章法”。

每天晚饭后，一帮篮球爱好者就聚集在教学楼后面的球场上，分不清谁是老师，谁是同学，大家你争我抢，呐喊声、加油声此起彼伏。林喜元老师高大英俊，中文专业的他永远是篮球场上最闪亮的星星。

周老师、罗老师、班主任罗老师、荣老师……

老师们在课堂上的讲解细致入微，我们在课余时间你追我赶。早自习，我们大声用普通话朗读，同学们相互正音；第五节课前，星期一三五练字、二四六轮流读报，伴有即将毕业的师哥师姐做指导；晚自习前，我们依次上台唱歌表演……

在教学楼的假山前，学校给每班分了一块水泥黑板，要求每两周更新一遍内容，主题、刊头、装饰、书写，都得自己班的同学上。因为围观的人比较多，还要评比，大家为了班级荣誉都暗中较劲，总是认真琢磨、反复调整，直到大家都满意才罢休。

班级合唱比赛、篮球比赛、演讲比赛……每一次活动，我们都全员参与。秋季运动会，我们自主选拔运动员、裁判员，组织后勤服务团队、拉拉队。

每个礼拜的一场电影由生活委员分发电影票。周末时分，我们到化机厂滑冰、去文明塔下野餐、赴韶山旅游……

十六七岁的少年，从活动的策划到执行，我们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。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，我们学会了合作沟通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提升了我们的责任感，也锻炼了我们的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的品质。这些都是攸县师范给予我们的财富。

【三】

三年的攸县师范学习生活奠定了我们人生的基调，帮助我们迈进了成人的门槛，知道了如何求知、如何做人、如何担当起教书育人的责任……正如王校长说的那样，从攸县师范毕业后，我们如同蒲公英的种子，飞向广阔的乡村校园。

凭借优秀的综合素质，强大的自学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攸县师范一部分校友克服重重困难，达成了自己心中的职业目标。有的转行进入党政部门，很快走上领导岗位；有的在商海中沉浮，创办企业；有的相继获得了大专本科学历，然后考研考博成为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，甚至成为全国知名的博导教授、作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歌唱家。也有的坚持教育教学工作，勤于钻研，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，走在教学改革的前沿，成为国家级名师……而更多的校友践行初心，甘于清贫，长期默默无闻地坚守在乡村讲台，为攸县、为株洲，乃至为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付出了毕生精力。

随着全国师范教育布局的调整，20世纪末，中等师范学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。2000年，攸县师范停止招生。从此，我、我们的校友再也寻不到母校了。可我从没忘记，我是中师生，我的母校是“湖南攸县师范学校”。



▲那时的攸县师范校门



2012年湘江毅行与同行朋友的合影。作者 提供

那时年轻

——忆2012年湘江毅行

黄 明

那是2012年，我还在上大学。

那年的徒步湘江毅行始于4月29日，线路总长63千米，从株洲走到湘潭，又从湘潭返回株洲。我背个背包，连续两天保持八个多小时不间断行走。

最初是三月里，野花（我的高中同学）在网上召集人结伴同行，我瞬间心动。

在确定不会延期的情况下，我和野花在28日晚上分别从不同城市赶回了株洲。第二天早上七点就在神农城广场集合，参加湘江毅行的启动仪式。八点多人群开始流动，流向湘江岸边和去往岸边的路上。3000多个人，50多台随行李工车、急救车，各种舞队和鼓队、拉拉队、引路人，场面欢腾极了。

我和野花在人群中穿梭，跟着我们的O队和素不相识的队长。人多了就好玩了，而好玩是不需要确定人群的，好玩的重心在于我们自己。所以队伍不重要了——我们轻而易举就跟丢了我们的O队。

在盛大的欢乐里，交流变得没有负担，我们成了社交“悍匪”。我们是跳着前进的，见到谁就跟见着亲人似的。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引路人，我们就跟引路人打招呼合影；有舞者歌者，我们就跟舞者歌者打招呼合影；有摄影记者，我们就让他们拍，然后拍他们。还有“背包哥”“帅高个”或“萌小孩”，都逃不过我们的相机。每隔一段路就设置了签到点，我们拿自己的身份牌去刷卡签到，得到饮用水、面包或是稀饭补给。野花也会伸出食指，点着陡壁上的某丛野花赞道：“有点意思！”

有一个男孩，他黑壮，穿着黑色工字背心，很长一段时间总走在我们前面或后面，没有同行者，没有行李，不言不笑，只戴着一副耳机。在熙攘的人群里，他非常特别。从我们开启的聊天中得知他上高一，他也就顺玩与我们同行。

“你们多大？”他问。我们说大三。“你们像初中或小学生一样，”他停顿一下，“我们学校的小学生就长你们这样。”他的语速很慢，掌控着我们聊天的节奏。他突然乐于表达，用诗词的口吻讲述他与英语老师的顽强对抗，说他是学习委员和另外几个已经被他忘却了名称的干部。没错，他说的是“忘却”。他向我们介绍他的学习和生活，像个长者。有时他会停下讲述，问我们学没学莎翁，学没学泰戈尔和尼采。

我们走着走着就不同步了。旅途中的“亲人”常常来去匆匆。但“辫子哥”不同，我们的确成为了朋友。初见辫子哥是在出发后不久，还是株洲段。一个下坡处，我发现了一撮男人的辫子。好奇心告诉我，这个可以收录到相机里。然后好奇心再告诉我，应该至少见这撮辫子主人的一张侧脸，最好是正脸。愿望很容易就实现了。

我们只叫他辫子哥，因为三千多人的大场面，每一个随机的相遇即是一场欢乐的别离，没有必要深究。在我与野花需要拍合影时，又遇上了他，就要他帮忙。一了解才知道，他恰好是一名摄影工作者。几次分别，又几次偶遇，于是我们决定结伴前行。三个人

的话题呈几何倍增长，我们添水的频率明显增多。

途中常响起信天游、号子或山歌，飘荡在蓝天白云、绿草湘江间。歌是起伏而传递着的，随时都会有人接上几嗓子，把歌递到更远处，有了一种北方的原始的粗犷辽阔，让人激动。尽管如此，但走久了就会乏，就会期待终点。路上各种骑着自行车或开着汽车的指路人会告诉你们：“不远了，只有半个小时了。”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不见终点，然后另一个指路人会告诉我们：“真的不远了，只有十分钟了。”然而半个小时终点还没影。再问，再说：“只有三分钟了。”尔后十分钟我们依然在路上。

到达湘潭是下午四点多，聚集在一所学校休整。从早上出发起中间没有休息过，人都没了筋骨似的，瘫坐在操场草地上。晚上在操场举行了晚会，一个巨大的party，我的兴致恢复不少。在看晚会时，我发现我的鞋底破了，好在有一双备用布鞋。

晚上下了雨。我们在学校礼堂里支起了帐篷。我和野花在帐篷里放音乐，清点脚上的水泡，从背包里翻出可用之物，偶尔探出帐篷，跟陌生人没头没尾搭几句腔。夜更深时，礼堂里都安静下来，我听着外面的雨声，有一种野生的快乐。

早上雨停了，但潮湿的泥土、草香以及泥泞的路面提示我们昨晚确实有过一场不小的雨。虽然阳光不盛，但暮春的紫外线已初见威力。

返程的精力大不如前。去的路上我们会用“O型腿”和内外八字来调侃自己因脚痛导致的难看走姿。回来时，我们已经无所谓内外八字，只觉得26个字母都被我们走完了，走到后面没有了款式。路面泥泞，泥巴在我鞋底粘了一层又一层，有时甚至会粘到脚抬不动又立不住。很多人开始在路边捡棍子当手杖，我也不例外。终于走过一段泥路，都有种“劫后余生”的轻松。我们不敢停下，因为只要一坐下，根本就不会再有起来的意愿。路上不断有收容车朝我们按喇叭，我和野花都摇头：“爬也要爬回去。”

实际上，跟“爬回去”也没太多区别，我们走路的速度像极了在路上数蚂蚁。快到终点时，我回头看野花，问她为什么不走走了。她说：“我一直在走啊，只是好像没怎么动。”我再问她别的，她就会用迷茫的眼神望着我，说：“我的心已经完全被我的脚占领了，容不下任何东西。”

到了株洲体育馆外，要过马路，我们得等两个红绿灯才能走过一条斑马线。我们看着迎接我们的鼓队和舞者，想奔过去抱住他们，但双方的手老早就高高举起，拥抱却迟迟无法兑现。

最终还是到达了终点，领到了毅行证书，疲劳也消散许多。辫子哥之后告诉我，他回家后看照片，发现我到达终点时的肤色和大地融为一体，只有一线白牙。他说，他会把照片处理一下。我的感激还没表达出来，他就补充道：我会把照片处理一下，把牙齿再调白一点。

至此，一段美好记忆在我生命里归档了。